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新自由主義國家霸權與邊境暴富主體的交逢：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案例

When Neoliberal State Hegemony Encounters Wealth Followers: A Case Study of Fujian-Pingtán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doi:10.6752/JCS.201409_(19).0012

文化研究, (19),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 2014

作者/Author：趙彥寧(Yen-Ning Chao)

頁數/Page：153-18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9_(19).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When Neoliberal State Hegemony Encounters Wealth Followers: A Case Study of Fujian-Pingtan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Yen-Ning Chao

新自由主義國家霸權與 邊境暴富主體的交逢： 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案例

趙彥寧

本研究為綜合四期國科會研究計畫案的部分成果，計畫名稱分別為「國境管理、遷移產業與跨國底層階級的形成」（2004-2007年，計畫編號：NSC93-2412-H-029-006）、「國境邊區生命政治：種族、階級、情感」（2007-2010年，計畫編號：NSC96-2412-H-029-002-MY3）、「金錢政治：鉅變中的國境邊區道德經濟（2010-2013年，計畫編號：NSC-99-2410-H-029-043-MY3）」、「境內關外：國境邊區準流亡公民身分的成形」（2013-2015年，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29 -013 -MY2）。彭澹雯、鄭美芳、黃惠欣、紀穎如、蔡脩君、郝洪芳、吳靜芬、陳玫蓁、周睿超、林培涵、葉守禮、陳遵宇先後與我共赴福建省平潭縣進行田野調查，文中部分文獻承楊智傑、楊凱評、鍾光聖、周睿超費心蒐集，牛津大學毛彩霞同學與我分享研究發現，中研院社會所陳志柔研究員提供中國地方開發多元行動者研究文獻，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舉出專業修改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電子信箱：ant5354@gmail.com

摘 要

本文探究閩北國境邊區在2010年海西特區和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成立之後，為求建設與台灣「五個共同」（「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兩岸共同家園」，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針對該島居民而設計與施展的治理手段、以及底層公民的日常生活生命政治狀態。本文的結論為，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的金錢幻術治理模式，已然成為此刻的道德經濟衡量準則，在此情境之中，常民也日益喪失社會能動性（更遑論反抗既存威權體制）的施展能力。

關鍵詞：海西特區、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兩岸共同家園

Abstract

The PRC central government's institution of the Economic Special Zone to the West Coast of Taiwan Strait along southeastern China, in particular the Pingtan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in the year of 2010 calls officially for building up a "Cross-Strait Common Homeland" together with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that w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Five Commons" ("Common Planning, Common Development, Common Organizing, Common Management, Common Profit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ans by which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manage to govern the residents of Pingtan, as well as the bio-political condition the local underclass are experiencing on a daily-life basis. It concludes with the argument that neoliberal market logic in the form of money-fetish value has become the overriding principle of moral economy, which renders local people increasingly powerless in the face of the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regime.

Keywords: Economic Special Zone to the West Coast of Taiwan Strait, Fu-jian Pingtan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 cross-strait common homeland

一、「兩岸共同家園」：總是附著於對台戰略考量而不／建設的平潭¹

本研究試圖藉由金錢政治這個議題，以海西特區中的平潭綜合實驗區為已達十年的田野調查場址，²試圖分析閩北國境邊區的常民道德經濟體系。本文對於「金錢政治」的操作型研究定義為：藉由個人與其所屬社群的金錢運用實作與想像、境內和跨境金錢流通和轉移的途徑和策略、以及以貨幣制度為基本計量基礎的商品化交易關係（包括親密領域的商品化計量關係）等議題，以探究個人、社群、和體制化政治機構（包括制訂、規範和協商相關法規的地方政府相關機構）的權力組織技術和實作方式。延續早期經濟人類學者的概念（Parry and Bloch 1989; Sahlins 1972; Scott 1977; Thompson 1971），本文將「道德經濟」定義為「社會正義、人際倫理和經濟利益互相建構、並彼此強化正當性的社會場域」；我也使用「道德經濟性」一詞，以指涉經濟活動所生產、再生產或改變的道德價值，而這個道德價值或為整體社會的道德秩序所規範、也可能僅為特定經濟活動參與者所共享。然與前述研究者所分析之相對封閉的文化和經濟體不同者，本研究試圖探究的「國境邊區」並非純然為中台兩地沿著國境（即台灣海峽中線）所形成的地理區塊，而是經由來回跨越國境邊區之閩北底層人士在境內和跨境遷移過程和勞動狀態中，所生產和再生產之社會關

1 源於議題的敏感性，在趙彥寧(2007, 2010)過去有關無證移民和跨境母職的研究論文中，「平潭」皆化名為「永樂」。然而隨著2010年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成立，該島的發展不僅廣受兩岸媒體報導，實驗區的政治意涵也成為立法院質詢行政院長和陸委會的焦點之一（如，自由電子報2012/03/17），化名的必要性故而不存在。

2 自2004年1月至2014年4月，我已赴平潭進行九次田野調查，訪談人數近三百位。訪談對象包括實驗區管理委會主管、退休和現任縣政府幹部、訪鄉和常居人民、基督教會神職人員、外省務工者、交通運輸勞動者（公交車、出租車、「黑車」、「摩的」駕駛員）、海峽號工作人員、小學教師、台商；參與觀察場址包括城關與農村民居、沿海偷渡點、鮑魚和海菜養殖場、基督教會、幼兒園和才藝教室、美容美髮店、新興民宿、開發公司、出租車公司、海峽如意城等建設工地、台商聚會場所、對台小商品競標場、東澳運滾碼頭。

係（包括親密關係、社會倫理、雇傭關係、跨國族連結關係）與自我生命治理所涵蓋的地理區位、以及這些人士和形塑其生命政治之國家治理機器與其代理者（意即下文將提到的「平潭綜合實驗區管理委員會」）互相遭逢的社會場域。

新中國成立之後，兩岸政治關係（或更確切地說，中共中央因應台灣政黨政治變化而制定的兩岸政策）全面性地影響福建省的經濟發展模式、而經濟發展指數又近乎絕對性地被該地常民視為關鍵的幸福指標(Anagnost 2004, 2006; Farquahar 1996; Rosen 2004)，以致於閩省較諸它省更為關注台灣政治發展，該地常民不僅總幻視(mis-conceive)³台灣總統選舉為推動特定兩岸政策的作為、本文分析之海西特區的構想與發展目的，亦植基於閩台共治的想像基礎之上。何以如此？儘管根據鄧小平在1988年9月提出的戰略性構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的發展」，但是基於對台戰爭前沿的考量，除了廈門經濟特區，中國政府有意忽視福建省的基礎和工業建設，以致閩省整體發展遠遠落後其他沿海省份，更遑論緊鄰的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區；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長李鴻階等人在2010年發表的調查報告即指出，2009年的數據顯示，該省GDP在東部地區排第八位、人均GDP排第九位，且差距逐步擴大（李鴻階等 2010）。上述「緩發展戰略」，尤其展現於平潭這個島嶼。根據1998年版《平潭縣誌》⁴和最晚近公布的統計年鑑（平潭縣統計局 2010），2011年以前仍隸屬於福州市的平潭縣由126個島嶼和702塊岩礁組成，主島海壇島（簡稱「嵐」）面積267.13

3 在此沿用Louis Althusser(1971)和Slavoj Žižek (1989)的觀點：被官方經濟發展邏輯意識型態化(ideologized)的平潭常民，不由自主地採取了官方建構的意識型態主體位置，將成功發展／發展停滯的二元對立關係歸因為其實並不相關之它者（意即台灣政治領袖的政黨背景）的善意或惡意介入，因此在無視國家暴力之時，也強化了國家權力的運作效力。

4 這是最晚近版本的縣誌。2012年底平潭將廢除縣級地方政府機構，改由2010年成立的「平潭綜合實驗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主管所有行政事務。

平方公里，是福建第一大島，中國第五大島，⁵戶籍人口三十五萬，⁶轄七個縣、八個鄉。百餘年來，平潭一向被福建沿海人士視為貧窮島嶼，「廈門富、金門貴、平潭貧、東山賤」的俚語具體地描繪了清治時期該四島的經濟與社會位階。在前現代社會小農經濟時期，平潭之「貧」與其先天資源的匱乏有關：該島海風強勁，缺乏防風建設，「一夕風沙起，埋沒十八村」的說法流傳百年，風害嚴重，乾旱頻仍，對漁農業傷害甚鉅，以致維生物僅為土豆和花生，近海養殖漁業是不穩定的經濟來源（趙彥寧 2007）。⁷1978年平潭縣統計局開始公布統計年鑒，1987年該縣劃為福建省十七個貧窮縣之一，1995年總人口36.23萬人，預算內總收入僅達5,942萬人民幣（平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8：314）；儘管因為文後將提到的偷私渡境外打工及隧道工程轉投資等因素，本世紀前十年平潭經濟大幅成長，2009年末戶籍內總人口數38.97萬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430元，但仍低於當年全國的平均數值17,175元，並遠低於前四大島。

前述戰爭前沿的政治地理因素，對平潭社經發展的影響尤為深刻。首先，自中古世紀起，位處大陸邊陲的平潭島即為軍事巡防之地；根據《平潭縣誌》(1998：2)的官方說法：

據民國《平潭縣誌》引《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州府志》：唐為牧馬地，宋初置牧監，不久撤銷，允許島民耕作，並增兵駐守。宋嘉佑四年（1059年）在鐘門（今屬蘇澳鎮）設巡檢司，掌管海上巡防。明洪武年間，為防備倭寇襲擾，強迫島民遷徙內地，致使島上百業荒廢，滿目瘡痍。此後，又因數度「禁海」、「遷界」，極大地制約著

-
- 5 就中國方面的角度，前四大島依次為台灣、海南、崇明、舟山；然而，同樣正在開發引資招商的廣東湛江東海島和大連長興島也對外聲稱為第五大島。目前並無官方公布的全國島嶼面積統一數據，不過，平潭人本身不認為此事有何爭議，因為自小即接受該島為第五大島的說法。
 - 6 然而，因於文後將提到的原因，常駐人口可能不及一半；另，這是報導人的說法，無法尋得任何相關統計數字。
 - 7 如同我做過參與觀察的幾處閩北沿海漁村，平潭常民對上述官方歷史並不清楚。民間口述流傳的移民史則是，該島乃大陸罪犯的流放地，這個說法與改革開放後的「偷渡島」自我認同具有高度親近性，故而不乏報導人半自嘲地以「窮山惡水出刁民」一詞以同時指涉自身。另，煩請讀者注意，「窮」、「惡」、「刁」等字彙，皆蘊含道德經濟的諷喻性評斷。

平潭海洋產業與對外交往的發展。直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禁令解除後，漁業生產與海上運輸開始復甦。清咸豐（1851～1861年）以後，平潭成為福建對台貿易主要口岸之一。……然而，平潭長期未能獨立建制，歷代政府只顧屯兵固防、設卡取稅，對經濟、文化投入甚微，因而，始終未能改變平潭落後封閉的狀態。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平潭作為國境邊區的地位更是顯著。該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距離台灣本島最近的領土，與新竹縣直線距離130公里；以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偷渡者使用的小型機動舢舨來說，約六個小時可到達直線距離最近的新竹南寮；而就2011年11月起直航台灣的客貨兩用渡輪「海峽號」而言，在無西北季風之時，僅需兩個半小時即可達台中和台北港。根據前平潭發改委幹部與其他不少在地報導人所言，源自特殊地緣關係，與閩北福清和長樂等偷渡鄉不同，⁸平潭人對於「美好他鄉」的想像範疇總是聚焦在台灣。在民國時期，諸如麵粉和火柴等「洋貨」皆來自台灣；如受訪者所言：「解放以前，我的父輩、祖輩都去過台灣，做生意的、拉人力車的都很多，也有的留下來」、「我們以前不知道福州，只知道台灣；哪條街、哪條巷、什麼地方好，都知道」。中國解放後，平潭成了戰爭最前沿，在「深挖洞，廣積糧」的文革時代，解放軍徵召民工挖掘全島的山洞隧道；兩岸關係緊張時，該島即為軍事演習重地，比如，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大選，該年三月中共中央軍委便重兵佈署東南沿海，三軍和導彈部隊入駐平潭，位於該島東南的將軍山即為前線指揮所。平潭身為對台國防前沿的政治地理位置全面性地限制了其經濟發展，弔詭的是，也正因為經濟條件差，台灣也長期成為該島常民仰賴的勞動獲益場址：在整個1980年代，台灣北部（尤其是南方澳和蘇澳）漁民即多在近海與平潭船主進行實為走私的「海上小額貿易」，藉此引入台灣的貨品主要為香煙、漁獲、海菜、以及閩省古工藝品；兩岸尚未直接官方溝通時，平潭即已設置台灣人民接待中心，

8 改革開放後，海禁漸開，又因省內經濟不振，眾多閩北常民循真假依親、結婚、留學、偷渡等途徑赴境外謀生，故而建立特定的境外遷移社會網絡，在1980年代末，海西即廣為流傳「日本怕福清、美國怕長樂、台灣怕平潭」的順口溜。

由縣對台辦公室和發展委員會負責招待暫泊於此的台灣漁業人士，同時，來自全國各地的女性聚居平潭外之沿海離島，專門服務「台灣同胞」的性產業曾興盛一時；直至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根據台灣蘇澳漁業報導人的說法，新竹以北市場販售的近海海魚仍多在海峽中線買自平潭漁民（趙彥寧 2007）。就本文初申論之「國境邊區」的意義而言，平潭（以及整體海西地區）更是扮演關鍵角色。首先，在台登記婚姻的三十二萬大陸配偶中，出生閩北者即逾六成；服務台籍漁船的大陸漁工逾半來自閩北；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台灣經濟產值大幅下滑之前，根據在地常民的說法，至少七成成年男性曾經由偷渡途徑來台打工，多半進入建築工地，從事前置作業的鋼筋和板模、以及後置作業的地磚、水泥、木工、和油漆等勞動，餘則在鄉間家庭工廠擔任電鍍和焊接等「黑手」工，亦有不少進行農村家畜養殖和高山蔬果採收（趙彥寧 2007、2010）。偷渡去台打工是如此正常化的非法男性勞務，乃至於在綜合實驗區設置以前，平潭全島遍佈倡導計畫生育（「計畫生育好，致富又養老」、「關愛女孩就是關愛民族的未來」、「計畫生育功在當代，利在後世」）與防治偷渡（「在此偷渡，死路一條」、「參與偷渡可恥，勞動致富光榮」、「嚴厲打擊偷私渡活動」）並列的大紅色標語。

然而，前述灰色與非法經濟的收益皆循地下錢莊的途徑匯回原鄉蓋房、娶妻成家、轉投資其他文後將述之灰色項目，完全無助在地基礎建設。為求突破發展困境，2004年初，福建省委省政府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設「對外開放、協調發展、全面繁榮」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以下簡稱「海西特區」）建設方案，並提出「實施項目帶動、發展縣域經濟、培育產業集群、發展中心城市、提昇民營經濟、轉變政府職能、促進文化振興、推動海洋開發」等八大規劃。此處所謂的「對外」，實指台灣（意即「海峽東岸」），在福建省社科院和香港政黨民建聯的相關規劃書裡，該特區意指「台灣海峽西岸，以福建為主體包括周邊地區，南與珠三角、北與長三角銜接、東與台灣島、西與江西的廣大腹地貫通，是一個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綜合性概念的區域」。然而當時兩岸仍處於備戰狀態，該方案擱置

四年，直至2008年台灣政黨再度輪替後，中共中央方開始積極推動海西經濟區的計畫。2009年，中國國務院批准「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計畫」。十分明確地，從中共中央的角度來說，海西特區乃為以兩岸統一為戰略性標的，而設置的國族主義式綜合型特區，就這個意義而言，其在全國全國上千個經濟特區與經濟發展區中特殊的位置，不言可喻。如相關研究報告所指出的：

2008年台灣政權發生變化，兩岸關係出現巨大的歷史轉折，2008年底兩岸「三通」的實現和協商機制的建立，也推動了經濟進入更緊密發展的階段——兩岸經濟合作框架(ECFA)開始進入談判，並已於2010年6月9日簽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更凸顯兩岸合作的重要性，海西區升級為國家戰略成為必然選擇，海西區正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新突破，謀求新崛起。海西區在未來國家發展戰略版圖中，具有唯一的、不可取代的戰略作用。將成為國家又一個戰略性的經濟增長極，也將成為連接兩岸的戰略通道，連接兩岸的「超級城市群」，並將以跨海席互動發展模式，形成「海峽經濟核心圈」。(民建聯、封小雲 2010：2)

在如此的戰略性經濟區發展思維下，「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案」在同年通過，且為中共建國後第十二個五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簡稱「十二五規劃」⁹）的重點項目。沿用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三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中央將一如既往地支援經濟特區大膽探索，先行先試，發揮作用」），平潭綜合實驗區成為「加強兩岸交流與合作」的「先行先試點」，如之後將不斷重述的官方話語所成，其目的為：

積極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積極爭取國家支援，推動設立兩岸合作的新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施旅遊購物、人員往來、貿易投資等特殊政策，推動兩岸金融合作，實施方便台胞就業生活的措施和財政稅收優惠政策；積極探索「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¹⁰的兩岸合作新模式，廣泛吸引台灣規劃機構、各界人士參與開發建設，推動兩岸同胞共建幸福家園，實現互利共贏。（華夏經緯網 2011/03/30）

9 有關該計畫綱要，可參見新華社(2011/03/16)。

10 日後簡稱為「五個共同」。

且根據實驗區城市功能布局藍圖，全島將劃分為中心商務區、港口物流經貿區、兩岸商貿合作區、科技文教區、國際旅遊休閒區、濱海新城區、科技文化創意園區、以及新興產業區等八大區塊，各自針對特定台灣企業、機構和人民招商引資。

轉瞬間，平潭便由砲口對台的戰爭最前沿，成為「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開發伊始，不斷突破記錄的金錢數字便是標示平潭地位驟變、啓發對奇觀式未來之想像的關鍵符碼：自2010年中起，「一年一個億，一天一個樣」、「一天一個億，三年一千億」的紅色標語貼滿全島，意指中共中央將以每日投入一億元人民幣於該島開發，故其建設必可以日新月異的形貌不斷展現。身為兩岸合作示範區，也表示平潭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正常化：其孤懸海外的邊區地位，在2011年初平潭福清跨海大橋建成後宣告終結；而過去遍佈福清至平潭高速路、以及平潭漁村的各式嚴厲打擊偷私渡標語，則為「和諧海西」、「創造平潭速度 推動跨越發展」、「爭分奪秒趕工期 勞動競賽創一流」、「兩岸合作 先行先試 建設共同家園」等等口號所取代。此年年初開始移山填海工程，過去連接大陸海上接駁的娘宮岸邊鹽田在年底填平，改名為「金井灣」，簡稱「新區」。與中國各級城市發展模式一致的，平潭政府以該島土地向國營銀行貸款進行開發，炒作房地產則是回收融資的首要手段，故而，在環島公路動工未久，預定在金井灣心區建造的「海峽如意城」豪宅，即於2012年六月開盤；¹¹而代表台資企業龍頭的冠捷科技亦預定於2014年底在此設廠。同段時間裡，環島公路開始建設；過去與台灣海上貿易和非正式與地下勞工輸出最頻繁的東澳港，在該年年底建成高速客運滾動碼頭，「海峽號」客輪在11月30日首航台中港；年底「平潭綜合實驗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緊鄰跨海大橋和海峽如意城設立，一年後完全取代原縣政府的行政功能。預定在該實驗區內，台灣居民將可免簽證入島、商品免檢免稅、同時使用新台幣和人民幣、參照港

11 建設該豪宅的建設公司為香港的世茂、恒基、新鴻基、以及台灣的遠雄和東元所共組的集團。另，「開盤」意指規劃完成、開始販售預售屋。

澳模式，兩岸車輛無需換牌即可互相登陸、台灣居民若在此定居，可以直接參與該區的行政管理、2012年起實施「四個一千人才工程」，預計在五年內分別自台灣、海內外、福建省內、以及實驗區內引進或培養各千名專才等等。¹²

平潭綜合實驗區開發案意圖對台引發的政治效應，並非本文的研究動機，¹³而是希冀藉由平潭這個貌似訴諸國族主義的非常特區，以探究新自由主義國家霸權與在地常民之間的互動及互相想像的關係、並藉此理解晚近中國市場經濟邏輯何以能夠產生效力。本文下一節「永遠追趕不上的『平潭速度』：超前開發進度的商品房價與民生物價」，將陳述實驗區官方如何訴諸建設與金錢的量化數字以魔幻性地彰顯國家／市場權力、而常民又如何在地多重矛盾交錯的情感狀態裡體驗特區開發的社會變動。本文第三節「並不天真的受難者：總在追求暴富的國境邊區主體」，將說明財富的在地意義及其取得模式，並藉此解釋何以瞠乎發展速度之後的平潭常民顯然未予抵抗。本文第四節「與金錢政治互構的道德經濟：合謀與反抗之間的灰色主體」，則將反思道德經濟的相關理論，並重省前三節的民族誌資料，以試圖探究晚近中國新自由主義市場掛帥之情境裡，公民之能動性的意義與限制。

12 可參見其入口網站<http://www.pingtan.net/1/>。

13 是否以及可以產生何種政治效應，實難在第一個五年計畫發展過程裡查知。直至今日，台灣朝野對該實驗區的公開態度相當曖昧。2012年三月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陸委會已明確表示「不接受一國兩制」，並反對台灣居民擔任平潭實驗區共同管理之職。不過，台中、新竹、基隆和金門等執政黨主政的縣市長，皆積極以海峽直航和互相投資等形式參與該實驗區的發展；早在2009年9月，官方色彩甚深的中興、世曦、中鼎、亞新四大工程公司即組成策略聯盟，向實驗區管委會提交規劃服務建議書；當年年底，具有執政黨中常委身分的春保錫鋼集團總裁廖萬隆考察平潭，並公開發言鼓勵台商來此投資等等。反對黨顯然也未完全置身事外：比如，2011年六月平潭管委會特別針對「台灣南部的底層人民」而發佈「台胞來平台創業就業的優惠政策」，該月中在高雄金典酒店舉辦「平潭實驗區開放開發說明會」，受邀致詞的檯面下協辦單位即為該市都發局局長；2012年總統大選敗選後不久，高市民進黨議員康裕成也公開向該市市長兼黨主席陳菊建言宜派員考察平潭。

二、永遠追趕不上的「平潭速度」：超前開發進度的商品房價與民生物價

海峽大橋是福建省內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跨海大橋，從開工伊始，就不斷刷新著國內橋樑建設速度的紀錄。大橋去年11月開始通車，比原訂計畫整整提早了九個月。今年三月份，蒞嵐考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滿意地說：「平潭開放開發不是一般的事情，就是要體現高效率、高效益，就是要體現平潭速度。」副橋能否複製這一奇蹟，甚至超越這一速度？（福清新聞網 2011/05/05）

2011年底，海峽如意城進入平潭人的視野，成為全島矚目的時代巨擘。2012年3月，海峽如意城率先在美推介，引發海外投資大亨趨之若鶩。5月，海峽如意城展示中心耀世揭幕，一抹華彩綻放平潭夜空。6月13日，海峽如意城首批高層住宅雍景苑一期開盤，短短數小時即宣告售罄！創下「時光」傳奇！時代的鉅獻，7000年的等待換一次絕美邂逅。這座扛鼎平潭綜合實驗區拓步大發展的世界級綜合項目，在敞開大門，喜迎未來主人的那一刻便上演了一幕火爆萬分，人潮如織的喜慶盛宴。「海峽如意城緊鄰平潭政府新區行政中心，五星級酒店，大型購物中心也近在咫尺，我相信這裡會成為平潭新的城市中心」，平潭人張先生毫不掩飾對新區未來規劃的期待。而從福州專程趕來買房的陳小姐表示：「平潭已經是特區地位了，這兩年平潭的房價一翻再翻，終於等來了有檔次的大項目，這次一定要抓住機會，我家的親戚都出手了。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啊！」（新浪房產 2012/06/14）

長年緊隨經濟利益和投資可能的國境遷移者，總是擁有最時興的相關訊息。2004年初，福建省政府計畫向北京中央提出海西特區規劃案期間，平潭報導人即向我轉告此事。他們不了解規劃案的具體內容，但是知道平潭開發的第一步就是建跨海大橋，這表示濱海區和縣城內將興建沖天豪宅，房地產勢必大漲，故紛紛勸我儘早購屋：「（台語）時機到了，你就會發！」之後每年我們赴嵐島調研，他們便再提一次：「你台灣人有錢，買幾套都不是問題嘛」，見我沒有動靜，才講出顯然計畫已久的盤算：他們缺乏融資管道，很難入手，但期待藉由我們的人頭買屋炒房：「買一套就不知道賺多少！」。歷經四年，平潭海峽大橋終於在2008年2月27日正式開工，原計三年半完工，然而在服膺中國解放後「追求速度、創造奇蹟」的建設邏輯下，

提早九個月在2010年11月30日建成試通車；而在其後兩年之間，包括前述海峽如意城等數十項小區建案紛紛開盤，縣城商品房房價也由2004年的每平米二百至四百人民幣，急升至2012年中的八千至一萬出頭，甚至緊逼福建省會福州市的高檔房價。如國境邊區報導人們所預言的，特區建設的速度啟動了房地產攀升的速度，這個速度建設的邏輯為何？平潭常民在如此雙重速度交織的發展過程裡，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如何因應？

「速度建設」的典範，顯然是新中國建國十年當日啓用的人民大會堂。該會堂位於北京市天安門廣場西側，為全國人大代表開會、以及迎接邦交國首領的場所，故而視覺性地象徵(iconize)了國家主權的兩個關鍵組成元素：黨國與公民的關係、以及本國與其他主權國家的互相認可關係。為求展現建國第一個十年的建設成果，並鞏固1950年代末對外（中蘇交惡）和對內（三年困難時期）的主權危機，該會堂在1958年10月動工，以「創造記錄」的方式在1959年9月建成，而「透過人民自發的力量以克服萬難，因此在不斷創造全世界最短記錄的時間裡，打造全世界面積最大、容積最高等等的項目，也成為「創造中國奇蹟」的典範話語。¹⁴在一甲子的時間中，因於前節所述的「戰爭最前沿」因素，平潭一直被排除於此類民族國家主權的視覺性展演場域之外，弔詭的是，實驗區成立後被驟然納入「向境外展示速度奇蹟」建國話語語境裡的平潭常民，卻又再次體會了在在與地域、階級、財富實質互構的「共和國次等 / 化外公民身分」，且具體彰顯在日難取得的生活基本資源與越趨可見的社會差異之上；值得注意

14 比方說，2010年九月底，因應「新中國建立六十年之際」，由北京電視台製作播出的《人民大會堂——神聖殿堂》紀錄片（京華時報2010/09/29），便由以下話語貫穿這個「奇蹟敘事」：「為了讓人民大會堂在國慶十周年前竣工，上萬工人們開始了和時間的賽跑，人民大會堂從開工到建成只有十個月，這是一個什麼樣概念呢？舉個例子，聯合國大廈的建成用了七年、而澳大利亞的悉尼歌劇院用了整整十四年」、「這是一個奇蹟」、「創造了另一個令世界驚嘆的中國速度」、「據說世界最大的三角鋼琴在捷克，是十二英尺，那我們就做個十五英尺的吧」、「北京副市長萬里說，今天我們能夠在這裡開會，表示我們勝利了」、「毛主席對萬里說，你是萬里啊，日行萬里，速度快」，等等。

的是，階級兩極分化固然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日趨顯著的結構性現象，平潭人的次等／化外公民身分狀態，仍然依附在「既在境內、又在他鄉」的台灣之下。

出生於1981年的薛晴，¹⁵便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報導人。薛晴的父親在1980年代裡，由前節所述的兩岸海上小額漁產品貿易發跡，因此結識不少台灣東岸漁業主，她常至感得意地向我表述之事，即為2005年結婚時「我那些台灣的伯伯叔叔阿姨哥哥姊姊們啊幾十個人都過來吃喜酒，沒有一個喜酒比我這個更盛大的啦！好有面子啊！他們看我長大的嘛！送了我不知道多少禮物！」嵐台漁業貿易終不可恃，本世紀初，平潭海產日益枯竭，加以國內轉投資項目失利，父親負債累累後移居大連市，借助大女婿的拉丁美洲海外關係，改而從事大魷魚等遠洋魚鮮內銷業務。薛晴在福州市某中專取得舞蹈科學位，畢業後與家族從事海運的同鄉丈夫結婚，並在左近平潭縣城的A鎮立小學教授才藝。2012年7月調研期間，她開車載我們去剛開始投資經營的兒童才藝培訓中心。之所以做此投資，也是因應平潭開發不得不然的作法：離金井灣最近的A鎮是環島公路的預定起點，當時已近拆遷完畢，她任教的學校會遷往何處、或甚至會否關閉，無人知曉，焦慮的教師們不能不預先自謀出路。如同所有的嵐島報導人，薛晴有關未來想像和規劃的焦慮敘事皆訴諸貨幣盈虧的邏輯。她解釋為何投資才藝教室：「平潭很變態，現在私立學校到處都是，學費很貴很貴的你知不知道？」¹⁶一般人還是把孩子送去念，不然怎麼辦？過兩年公立的會不會存在你都不知道」；再補充：「以前平潭人不重視教育，讀書幹什麼？隨便偷渡去台灣打工都可以娶老婆，唉唷現在能行嗎？所以只好培養小孩子讀書，那將來還比較有可能賺點錢」。至於學校周圍拆遷戶的處境，她顯然漠不關心。我問：「他們願意嗎？拆了以後搬去

15 為求保護報導人，文中所引人名皆為假名，且足以顯示其身分的部份背景資料，亦略作修正。

16 學費一般為每學期一千五百塊人民幣，一年三千。與教育資源豐富、並藉此區隔城市人民和外來農民工的一、二線城市不同，在平潭，農民工以及有能力和意願擔負學費的本地人皆將子女送至私立學校就讀。

哪裡？」，她答：「不知道。不願意那你有什麼辦法？要是在台灣那兒，你們大概就去抗議了，可是我們在中國，我們是順民啊」，講完還自嘲地哈哈大笑；她認為拆遷費才是問題：「不知道可以拿多少？拿不拿得到？」一路上她不斷叫嚷：「你看平潭現在就是挖挖挖、拆拆拆，我車窗都是灰濛濛的，髒死了，氣死我了！物價那更不用說，漲漲漲，我活不下去啦！」所有平潭報導人都不清楚實驗區發展的具體走向，薛晴也如其他人一般地想從我這兒取得（或許比較可能）正確的資訊：「你們來這邊，算是考察項目嘛，應該去找政府部門，請他們做嚮導啊」；我表示前一天已經去過管委會：「你也可以過去啊，在那一樓有個平潭發展圖嘛，請解說員給你解說一下」。她口氣又急又蹊蹺：「唉呀，那是給比如說開發商，引進外資的，他來專門去說這個東西。我們普通老百姓，他幹嘛跟我說？我們是有千萬、還是億萬可以去投資嗎？」我們這時經過金井灣邊尚未被鏟平的一座小山，壁面上懸掛「大幹一百五十天」的巨型看板，我詢問其意，薛晴又嘲諷般地尖聲笑了：「中國的『大幹一百五十天』的意思就是定個指標，在這麼多天裡頭『我』一定要完成的，而且時間越短越好。平潭等於以前是土八路，現在急著要變成新四軍嘛！」笑完再解釋：「具體的我也不全懂，大概就是說下地基啊、填海啊、海峽如意城開盤啊這些的都得完成」。我表示驚訝：「一百五十天太快了吧？」薛晴的語調越來越尖銳急促：

這個建設非常非常非常快，快到我難以置信，就是，只要我出門去福州比如說三、五天，喔，我就看到它變化。不知道那種變化是讓我是喜是悲，就壓力很大。我每次一回平潭，就覺得壓力很大，就覺得不想在平潭生活了。你看，我這兩年在平潭隨便吃個早飯都要十幾二十塊錢，我上個星期在福州跟我老公兩個人吃，吃得我眉毛都笑彎了，兩碗很大的稀飯，然後一碟肉鬆，然後一個茶葉蛋，還有一個油餅，你知道多少塊錢？才五塊！

她的結論是：「將來平潭是屬於有錢人的地方，平民老百姓我看就是要遷出平潭本島了」。遷去哪裡呢？她又自嘲般地尖聲笑了：「就是（大陸地區離平潭）最近的（福清市）高山（鎮）啊、三山（鎮）啊！我不是去年就告訴過你，說要搞實驗區以後，那兩個地方房子立刻就漲啦，現在也跟福州的房價看齊啦！有遠見的平潭人現在

都得考慮去那裡買房，不然你將來怎辦？你房子都給你拆光你要去那兒？」

從批判理論的角度來看，純粹以數字呈現的市場價值與開發速度，形同Michael Taussig(1993: 22-23)援引Walter Benjamin所述的「金錢／價值神物」(money-value fetish)：透過了「數字神物」，商品房與巨型國家建設的榮光遮蔽掉了價格(price)與價值(value)實為社會建構的本質；延伸地來說，當常民全皆信仰該神物必然造就社會福祉之時，也顯然成就了國家的「金錢幻術治理」效應。然而，田野資料也顯示，平潭常民對於數字神物的情感經驗(affective experience)是雙元的：她／他們固然極力將自我轉化為追隨該神物的社會主體，但是在另一方面，越趨可見的社會階層差異也造成了日常生活中具體感受的苦難(sufferings)；相當諷刺地，表述這些苦難的指標，也是某種速度幻術——即，彷彿永遠也追趕不上的民生物價和房價。以飲食為代表的民生物價難以負荷的漲幅，¹⁷是所有該島常民（尤以成年女性為然）最熱烈的談資，典型的「痛苦敘事」奠基在「現在／未開發前」和「此地／內地」的時空二元對立軸之上；這個對比已顯現在前引薛晴的言詞裡，而對於由農村遷居城關租房的平潭報導人而言，其感受更為深刻。比方，2012年7月底我們訪談五年前由鄉鎮來城關尋找赴外地打工和投資項目的林氏家族。林先生和大兒子與大女婿長年在內地從事工程項目，二女兒美花在六年前假結婚赴台打工，當年初為台灣移民署查獲，5月時曾在南投收容所接受我的訪談。林家人在縣城裡近森林公園入口處承租一間套房，三代共八名成員聚居在約四十平米的空間裡，六層樓房內其他承租者皆為由四川來此從事工地勞動的農民工。根據美花母親蘭英的說法，五年前每月房租300元，五年前漲到560，這一年已提至800元，若想承租一整層，就得付1500：「前

17 飲食固然是民生基本必須，也具有高度的文化（以及「國族主義」）價值，故而不乏報導人皆表示：「民以食為天啊，老祖宗就是這樣說的啊」。同樣的案例為「土地」（包括地面上的樓房）：「中國人傳統對於土地的依戀、眷戀啊，認為土地永遠不變嘛，所以，你擁有了樓房，就擁有了土地，而且是可以留傳給後代的」。

幾天房東說下半年還要漲。唉呀，這個我們怎麼有辦法？這樣下去我們只好去買房，可是現在房價這麼高，哪裡買得起？」房價直接影響民生物價，蘭英繼續訴苦：

這幾年在平潭活得真是太難了、太苦了，就算是小市場裡頭賣的東西，也沒有一樣不是一直在漲。你看雞蛋，現在一斤五塊多，以前才三塊幾；豬腿肉，（一斤）十五塊，以前十一、二塊；就算最便宜的豆腐，也漲了一塊多！水果漲更凶，我們就說最普通的蘋果，現在（一斤）五塊五，以前才一、兩塊。交了朋友來家裡吃飯，比較高級的水果不能不去買一買。那你看，這紅皮葡萄，以前（一斤）五、六塊，今年差不多翻一倍，九塊五！水梨，皮啊粗得很，沒人愛吃，吃了要削皮，嫌麻煩，以前才一塊，現在居然要三塊五！我老公都在外地打工的嘛，他也嚇到了，怎麼我們這裡現在物價搞成這樣的呢？他最愛講的就是，蘭州啊、昆明啊、還有武漢啊、南昌啊什麼什麼這些內地，就算是雞蛋，（一斤）最高最高也不過四塊錢！

由前引報導人的敘事可知，在新區和城關隨處可見彷彿如道德律令的「買鋪（或『買房』）才是硬道理」¹⁸看板、以及房價不斷高漲所引發的多重交織情感效應至為強烈；且期待、恐懼、憂慮、後悔、羨慕、嫉妒、慶幸、驚訝、憤怒、不知所措等常超越語言表述能力的情緒，往往並存。商品房的價錢成為2011年後的常民知識，沒有一位報導人不急著向我們表述其驚人的變化。比如，2006年開盤的第一期「世界城」，一平米剛超過1000元，然而2012年2月以「紐約印象」作為廣告訴求的「世界城」第四期開盤時，一平米已達9000元；具有平潭開發指標性意義的「海峽如意城」，開盤價即為8000到10000元，眾人且聲稱漲到30000指日可期。¹⁹土地開發與商品房價不斷攀升顯然是晚近全中國普遍的現象，平潭經驗有何特別？我們必須了解，土地以及其上的建物對於改革開放的嵐島常民來說，同時具有以下三重價值：首先，此乃傳統意義裡的日常生活居住和再生產空間、以及父系傳承的永續物質基礎；其次，這是無懼死亡威脅與勞動艱苦的青年男性，往赴外地打工以展現陽剛氣概的具體成果，尤其是稍早二十

18 該標語挪用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深圳時所稱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一語。

19 若確實如此，則將與上海市的高房價齊比。

幾年裡勇渡素有「黑水溝」之稱的台灣海峽去台工作的偷渡客們，返鄉後莫不以「賺的第一桶金」在城關買地自建樓房，以為結婚生子的基本要件；第三，自建樓房的層數、以及內部的裝潢形式，也是各家戶之間互相攀比的視覺性展演象徵（趙彥寧 2007）。最關鍵者為，直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嵐島並無商品房的概念。2004年，原在台灣中部地區從事小型建設工程的台籍第二代外省子弟隨父親返鄉探親，應地方領導所請成立開發公司以推動城關都市建設，並推出第一批略具小區形式的商品房，此時並不存在「房屋市場」，每平米僅售兩百元人民幣，這個價格一直維持到實驗區成立之前。因此，當住房成為炒作商品後，前述三層的道德經濟價值勢必受到嚴峻挑戰，「祖屋」的概念搖搖欲墜、而尤其在全島將大幅拆遷的狀況下，其形式也將不復存在；男性維繫父系陽剛價值的途徑日趨嚴峻；可預期的，家戶間互相攀比的程度將更加緊密地附著於貨幣的積累這個條件之上。本文起始已將「道德經濟」定義為「社會正義、人際倫理和經濟利益互相建構、並彼此強化正當性的社會場域」，準此，可以推測嵐島常民對社會正義和人際倫理的傳統判斷與遂行準則，勢必遭到嚴重挑戰。而在該社會場域的重新建構過程裡，激烈的情緒洋溢於報導人們的言詞之中、也可能左決其行動。若干報導人如前引蘭英的房東，他們慶幸即早在城關建樓，晚近幾年且可將樓房分層分間租賃給外省農民工以賺取不斷暴漲的房租者。某些則如薛晴一般，既憤恨房價無可掌握、又嫉妒早幾年在花園小區置產者坐擁金庫、故而總自悔早失先機、且不斷猶豫應否離鄉赴鄰近大陸地區購屋；本節初所引新浪房產廣告詞「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啊！」的結語，怪誕逼真地(uncannily)預示了這個生存狀態。

在這種種負面情緒交錯的情感場域裡，終將無枝可棲的恐懼最屬顯著，其中拆遷戶是最顯著的代表。比方，2012年底我們在A鎮做訪談，該鎮當時僅剩十餘戶堅拒遷離祖屋的留守老人，他們的子女與孫子女長年在外省或國外打工，情緒最為激動的幾位聲稱若管委會逕行拆遷，必將抱瓦斯桶與祖屋同歸於盡。老人們不熟練地使用「釘子戶」這個之前對其完全陌生的自我認同稱謂（「在中國，有

一種人叫做『釘子戶』，你們知道嗎？」我們答是，老人自嘲般地笑了：「你們早就知道，我們要到現在才知道，原來我們就是『釘子戶』！」），但熟稔地交錯使用新中國建國革命語彙、以及嵐島傳統父系道德經濟話語，以試圖證成他們必須死守家園的正當性。1932年出生的林老伯普通話說得最流利，態度也最從容：

我第一句話就是要告訴你，我們這麼做不是反黨反革命，這個你一定要報導出去！我十五歲就入黨，我是老革命！我敢在這裡當著這麼多人面前拍胸脯告訴你，在我們A鎮，沒有人比我黨齡更長、沒有人比我更愛黨，所以黨提拔我，我幹過大隊書記。我小時候這裡怎麼樣地苦啊窮啊是你不能想像的，所以我要入黨。黨的恩情比天高啊！黨的話沒有一句我不記在心底，所以我反對迫遷，為什麼？胡錦濤已經做了指示，可以拆遷，不能迫遷，你要先蓋好安置房，才能拆遷，不然就是迫遷。可是我們這裡安置房會蓋在哪裡、什麼時候蓋得出來，到現在都沒影，上頭還千方百計要我們遷出去，他這不是反黨了嗎？他反黨，我當然要反對他！

應和林老伯的開場白，眾老人們紛紛激動發言。年紀與黨齡較其略少四年的陳阿伯幾乎掉淚：「這個拆遷不符合『以人爲本』的道理，你看那裡，你看到沒有啊？我親家的房拆了就算了，連祖墳也砍了，這像話嗎？我陳家宗祠同這個房連在一塊兒，我怎麼能同意拆？」隔鄰的王家老太太堅持請我們上樓參觀，在內地打工的孫兒將在明年初年節期間娶親，喜房已佈置完善，三層石頭屋由內到外每面牆與各個房間外頭貼滿喜慶裝簾，她反覆講：「喜事都還沒辦，怎麼可以要我們搬？」追根究柢，眾人最爲恐慌的，還是不知拆房後可以住去哪裡。沒有安置房，就得去城關租房，而鉅額房租既非自己所能負擔，他們也擔心年初天氣太冷，無法適應縣城裡的水泥房。「這不就是要逼死我們嗎？那麼不如死在老家還開心一些」，幾位老人流淚了。

在不過數年的時間裡，平潭常民的日常生活與心理和情感狀態確實如實驗區的發展口號一般，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在時間被顯著可見地轉化爲常民無法掌握之市場價值的狀況下，個人未曾預期、以及完全無法理解、更遑論跟得上的「平潭速度」，生產了既存

社會道德經濟秩序內前所未有的諸種負面情緒。其原因相當明顯：平潭綜合實驗區誇稱將打造的「共同家園」，實為新自由主義資本無限制積累、與之合謀的國營和外資企業、主權國家親近的民族主義、以及該民族主義試圖召喚的境外子民（即以台商為代表的台灣人民）的「共同受益」場址，與平潭常民並無關係。本文緊接的提問是：為何國家權力可以如此輕易地宰制在地常民？何以平潭常民似乎輕易地附從這個自我驅逐（與自我卑賤化）的行動？該個案研究又可如何幫助吾人了解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抑或國家與市場合謀的暴力實作？

三、並不天真的受難者：總在追逐暴富的國境邊區主體

1980年代以降，受到James Scott(1977, 1987)有關東南亞殖民地底層農民道德經濟研究的啟發，不少學者致力探究受壓迫者如何研發迴避和抵抗等「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而最終達到有效階級鬥爭的目的。然而，由前一節民族誌資料可知，此非平潭常民因應全島大開發的途徑，儘管莫不咸認本身為弱者，薛晴自嘲所謂的「順民」似乎並未使用任何具有抗爭意義的武器，為何如此？最簡單的解釋或許是，國家與市場合謀的霸權體制力道過於強大，故而無論何種形式的抵抗技術皆無設計或想像的可能；但是，這顯然與中國每年數千起抗爭之事實不符。²⁰平潭是否有其特殊之處；若是，又係為何？

由常民對前節所述「金錢幻物」的理解，或許可以一窺端倪。若該幻物之操作，為遂行國族主義與國家權力之霸權技術(hegemonic technique)，那麼，其效力絕非來自「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生產與再生產，而是近乎犬儒主義式(cynical)的認知與服膺。首先，對於「一天一個億，一年一千億」的官方說法，不少報導人態度輕蔑的表示，此乃「忽悠中的忽悠」。以下乃他們對於該

20 僅以2011年為例，根據香港勞工權益團體的統計，該年六月至年底的全國抗爭事件即達1,711件(Dexter Roberts 2014/02/20)。

數字魔術的說明。中央加地方政府具體出資的數字實為一年八個億，其中一個億需由地方政府自籌；財政枯竭的地方政府在都市規劃工作完成後，將預定拆遷的土地向國有銀行抵押並取得無息或低利貸款，以進行開發工程，償還日期則無限制。所有工程皆發包給諸如中鐵與武漢鋼鐵廠等國營建設企業，它們顯然是首要的獲利者。管委會可在建設項目規劃與分包過程中圖利私人，故而是必然的不當得利者；2013年十月管委會首任主委龔清概提升為國台辦副主任，次年四月我們在嵐島調研時，有關他被雙規並接受貪腐調查的傳言已不脛而走，說法為他將綠化工程發包給妻子的家族以謀取暴利。報導人的結論為：「國家從左邊口袋掏出錢，再放進右邊口袋裡」。²¹上述說法顯然是在地知情默會的常識(tacit knowledge)，其真相無需檢驗；我若反問可有證據，對方僅覺奇怪：「我看你來大陸這麼多次，怎麼還不明白這就是這裡政府做事的道理」。若再問，老百姓因國家和管委會不當得利而受害，豈不憤怒？衆人多答：「所以你看這幾年大家不都說中國就是『國富民窮』？」

然而，平潭人究竟是窮是富，其實是個與前引「國家暴富」之空虛性質高度雷同的問題。本文導論處曾引統計局的人均收入資料，然而長年研究者皆知，中國的官方統計資料翔實度可議。就理解平潭社會性而言，更關鍵的現象則為，人均收入的調查基礎為戶口制度，且未納入「灰色收入」（王小魯 2007）。平潭在地人對社會貧富的說法兩極，持貧窮論者皆是出外打工、或投資外省工程項目失敗的人士，典型說法為：「就是因為沒錢，才會去你台灣（或「說是兩個人就有一個得愛滋」的南非、「地下都埋著炸彈」的以色列、和「恐怖份子很多」的伊拉克）賺你們那裡一點點小錢」。持富有論者，則多藉由指涉他者之類同Thorstein Veblen(1967[1899])所謂的「炫富型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實作，以凸顯個人相對完

21 我並無田野調查管道以驗證以上說法的正確性，但證諸歷來的相關研究，可知此為中國地方發展的常態模式；可參見周飛舟(2010, 2012)。我特別感謝中研院社會所陳志柔研究員與我討論這個議題，並熱心提供相關參考文獻。

善的道德實作；典型說法為：「平潭有錢人很多啊！（或「平潭有錢的人那真的是很有錢」）有錢人平常都不在平潭，可是過年的時候你來這裡看看，城關街上都是名車，車太多，路根本就開不動」、「平潭人就是喜歡攀比，你看，三年前大家都買保時捷(Porsche)的卡宴(Cayenne)、²²兩年前是路虎(Land Rover)、²³再下來一年大家都買保時捷的四門跑車，²⁴沒有一輛的價錢少過一百萬」、「有錢的老闆買車，不管有沒有錢的都戴金項鍊，幾兩幾兩的金子給它打下去，越粗越好看」、「老公在外地賺錢平常不回家，平潭女人她沒事做，白天就去做美容護膚啦、美白保養啦，把自己搞得漂漂亮亮，給自己看、也給別人看嘛」、「所以你看，全中國哪裡有像平潭城關這麼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卻有這麼多美容護膚店呢？」。

然而，前引具強烈視覺展演性(visual performativity)的炫富實作，也彰顯了平潭在地經濟的高度不穩定性、以及「富裕」概念的虛幻性。與諸如Nancy Chen(2008)、Elisabeth Croll(2006)、Deborah Davis(2000)、Li Zhang(2008)等中國城市研究者所論有異，前述擬Veblen式的炫富型消費與中產階級興起之關連可議。為何如此？最關鍵的原因為，其致富途徑皆屬「灰色」項目，無助地方政府稅收，以致於該島民生建設頗差：比如，2010年實驗區開始建設以前，即便城關中心也乏水泥道路，一旦下雨，便泥濘難行，因此，「街上都是名車，車太多，路根本就開不動」的說法，也暗示了城關巷道如何之窄、以及如何難以承擔同類型中國三線城市的一般交通；再比如，平潭水電供應一向不足，即使在實驗區成立後，不少城關居民仍須自

-
- 22 在台稱作「凱燕」，係為兼具SUV(Sport Utility Vehicle)和跑車功能的車款，因此據說是跑得最快的運動型越野車。根據「易車網」的數據，該車款在2012年的售價，根據其不同的配置，在90萬到210萬人民幣之間(<http://car.bitauto.com/baoshijiecayenne/>)。而根據「百度百科」的說法，2002年「保時捷卡宴」進入中國市場，2006年「保時捷中國」銷出2,305台車，其中「卡宴」佔了約百分之八十的1,930台。
- 23 英國越野名車，係SUV車系的頂尖老牌，該品牌的車種眾多，在中國市場的價格低至四十萬、而高自四百萬人民幣。
- 24 應指Panamera（中文名「帕拉梅拉」）的四門跑車，首次亮相於2009年上海車展，根據車內配置的差異，報價為110萬至310萬人民幣之間。

費鑿井並儘量儲水，否則無法因應每隔數日即無告停止自來水供應的狀況。炫富者究係何人？何以致富與中產階級身分無關？除了個別例外，²⁵他們多在198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偷渡來台打工，以「第一桶金」在城關自建樓房、或購買稍早乏人投資的商品房，如前所述，其目的在於社會再生產（結婚成家）與家戶攀比，故而房內固然強調裝潢，但與階級轉化至為相關的生活品味、休閒志趣、世界觀、或感官經驗關連度不高。此類報導人家中最顯著的裝潢有三：五十吋起跳的液晶電視、家庭劇院式的環繞音響、以及理論上可供全家成員環坐觀賞電視的黑色皮面沙發，但這多僅是彰顯男性家戶長致富成就的必要裝備。比如，林平在2006年自台打工遣返後翻修增建城關老房，之後即赴江西「搞高鐵項目」。2011年7月19日早上拜訪林家時，他與妻子邀我們坐在客廳皮沙發上觀看佔據整個牆面的液晶電視，當時CCTV正在實況轉播西藏解放六十週年舉辦的慶祝活動，除了習近平出來講話時，林平漫應一句「嗯，這是習近平」、以及轉播結束後的結論「好像沒聽過平潭人去搞西藏高鐵的，那個項目檔次太高，搞不來」之外，西藏（以及西藏解放）顯然與他認知並且可以參與實作的世界毫無關係。不僅如此，Benjamin曾以十九世紀中期西歐常民生活為例，指出新興科技商品（比如照相、玻璃和鋼骨建築）可如何轉化新興中產階級的感官體會（可參見Buck-Morss 1991），但是以林家為例，他們雖然購買了皮面大型沙發，但卻未因此培養了欣賞高級皮件的興趣，而且顯然也不在乎皮料的真偽，即使沙發底下掉落皮屑（或塑料碎屑），也不在意。

那麼平潭人專注的「灰色項目」又是什麼？幾乎沒有例外，這些男性皆將境外打工所得投入外省隧道建設、以及晚近煤礦或鉬礦等稀有礦產開發的工程項目。當時正逢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發展大西北以及積極鋪設高鐵的階段；「打隧道的項目哪個省沒有？哪個地方沒有我平潭人在挖隧道？」報導人莫不自豪地如此表示。諷刺的

25 最常被引述的例子，為1990年代初期以海運發跡的某對兄弟：二人在青年時憑藉出眾的交際手腕及不凡的外貌而建立有力的裙帶關係網絡，並藉此寡佔了海運商機。

是，平潭人開鑿隧道的技術與其早年台海戰爭前沿的政治地理區位直接相關，而且，也正因為其在內地的社經身分邊緣，故幾乎僅能取得國營企業得標後分包程序裡的最小包。此類工程分包方式如下。比方，中鐵某某局集團有限公司取得連通西北某二省鐵路建設的標案，依高速、隧道、橋樑、地面建築等項目各自分出中包；以平潭人熟悉的隧道項目而論，再根據全程各段路線畫出小包範圍，家族團隊向親朋好友集資後，透過與在地政府相關公務人員的「關係」取得最小包，核心幹部負責監工與採買，由在地募集的農民工挖掘隧道。得包的關鍵階段在於「打對關係」，過程可長達兩三年，手段不出財色形式的「送禮」，形式不勝枚舉，每位成年男子皆可講述數則。譬如，2009至2010年底，曾來台打工十年的阿輝與友人在西部某省山區「搞項目」時，便曾送禮給女子中學校長，對方遂舉辦校園選美活動，敦請政府發改委稽查組官員扮皇帝選妃，挑選中意的女學生為二奶。

報導人們從不諱言在反覆送禮和層層分包的條件下，若可取得百千倍的暴利，純因「偷工減料鑽漏洞」。偷工減料的手段之一是轉賣鋼筋，他們直爽地表示：

鋼筋的價錢這十年國際市場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你國家裡鋼筋比如說（規定）做一個隧道一千噸，他就拿五百噸去賣掉，給我們老鄉去買，一年再怎麼樣都可以賺一兩百萬。你聽不懂怎麼賺啊？比如說你要賣給我，我先不付錢給你嘛，我先拉出去，因為大家都平潭人很熟嘛，見過幾次面啊打打招呼就好啦。好，我拉出去賣了，我錢拿回來放在口袋裡，剩下再拿回去給你，這樣你懂了吧？所以說，買鋼筋的人根本不用本錢也可以賺到錢。

另一常見的方式為透過抽水等方式，故意製造隧道頂部的落石或滲水等工安意外，藉此追加工程補助款。尤其在2008年下半年，中國政府為了因應國際金融危機而進行「大躍進式」的高鐵建設時，集資搞項目成為平潭常民最普遍與時興的投資方式。然而，隨著鐵道事故攀升，工程安全檢查日趨嚴格，2011年二月鐵道部長劉志軍免職雙規，至此隧道暴富夢灰飛湮滅，短短數年間許多家戶也歷經了「沒錢」到暴富、再回到「沒錢」或甚至舉債的過程。這個劇烈變化的過程也具象地顯示於前引卡晏、路虎、保時捷四門跑車之上：名車是全

中國不分城鄉差異的炫富手段，然車種之選擇則具有高度在地社會性質；該三車款皆為SUV，足見炫富者皆為在偏省從事隧道和礦產工程項目的「老闆」。2010年之前，他們也同時配置寶馬與奔馳等名車以供平潭家人日用，而晚近工程項目取得不易，此二車款也就少見了。

表面看來，平潭人追尋暴富的慾望與晚近二十年的中國常民一致，²⁶而與之相關的「貪官敘事」，也和他處無異；²⁷然而，形塑該慾望的動機和限制、以及「貪官敘事」在此過程裡發揮的作用，卻具有關鍵性的差異。對平潭人而言，「貪官」並非窺奇的對象，而是追求暴富的過程中必須實際交逢和協商的資源分配者。此類敘事故而多為血淚辛酸與炫耀攀比交織的見證敘事(testimony)，炫耀攀比之概念類似Jane A. Margold(1995)分析東南亞男性移工自我敘事時所提出的「邊境陽剛氣概」(border masculinity)，而「貪官」諸種貪欲的作為，也間接彰顯了邊境男子「出外打拼以養家活口」的男性美德；易言之，在追求暴富的過程裡，貪官與邊境男性乃屬一體兩面的存在，甚至可以說，前者是後者力求企及的夢幻目標。這也解釋了以下的現象。首先，暴富投資的失敗與受騙比率甚高，然眾人僅歸諸於自己「運氣不好」，而其留守平潭的女性家屬則皆責怪他們「太笨」、「不夠努力」、「怎麼在外頭闖了這麼久還像小孩子一樣什麼都不懂」，換句話說，投資失敗（意同金錢的可觀損失）彰顯了他們缺憾的陽剛性質，而非該類逐利行為的實作規範不當。其次，追逐暴富者從不認為「打通關係」的諸種手段有違社會正義；以阿輝為例，當我表示誘騙中學女孩充當發改委官員二奶「不太好吧？」，他同其他幾位投資夥伴很覺可笑：「這有什麼？女孩子自己也很樂意啊！」而阿輝在旁聆聽的姐姐阿鳳也微笑說：「老師，在我們這裡都這樣的」。第三，逐

26 「一夜暴富」的敘事，顯然也是晚近全中國社會的「都市傳奇」，在Google搜尋網站鍵入「暴富」的關鍵詞，即可取得一千兩百三十萬則相關訊息，且大型商業資訊網站（比如「阿里巴巴」）莫不廣為招徠「一夜暴富」的投資項目（2012/08/22瀏覽）。

27 伴隨著1998年朱鎔基上任國務院總理後的打貪行動，具有高度窺奇性質的「貪官敘事」也成為正式與網路連載的紅火出版品。暢銷作品頗多，可參見大洋(2002)；何能高(2006)；鳳凰週刊(2011)。

利的目的既然是在彰顯個人突出的勇氣和能力、也是家戶間公開炫富攀比的唯一途徑，其本質實與願意想像陌生他者福祉之現代公民性大相逕庭；故而，即使衆人皆知偷工減料很可能造成嚴重工安問題，並且可以隨口舉例哪一年在何處的哪項嚴重隧道坍方抑或鐵橋倒塌事故的工程「就是我平潭人做的」，但從不感覺不安，也不認為己方負有責任，普遍的說法為：「偷工減料在大陸到處都是，這次只是某某（平潭投資者）運氣不好而已，以後他再投標可能就比較難了」。第四，報導人對雙規下台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懷有某種同情性的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典型的說法是：「中國的官都差不多，他可能只是貪的比較多一點而已，而且跟『上頭』的關係沒搞好」；並且自憐：「這下子我們平潭人倒楣了，錢收不回來了」。最後，既然實驗區管委會官員的作為與諸如劉志軍等外省貪官大同小異，又何須撻伐其道德不義？薛晴等報導人嘲諷自況的「順民」之社會脈絡性意義，實為如此。

四、與金錢政治互構的道德經濟：合謀與反抗之間的灰色主體

「平潭速度 平潭質量」、「安全生產文明施工 爭創優質精品工程」、「創優質 守信譽 為三航爭光，精管理 出效益 為企業創利」、「責任讓生活更美好」、「維護交通秩序 爭做文明公民」、「豎立交通文明意識 提昇城市文明形象」（2010年至2014年，從金井灣新區到城關裡，一路上看到的「素質」標語）

由本文前三節的民族誌資料可知，平潭綜合實驗區與傳統定義的經濟特區大不相同。非常弔詭地，該島徘徊於「戰爭前沿」與「兩岸共同家園」之間的政治地理地位，也決定性地左決其自我認同、公民想像、勞動技術、社會關係、貧富認知之形貌。在一甲子的時間裡，嵐島人歷經戰爭砲灰、偷渡客、高鐵開發投資客、與對台和平統一行動者的身分，並因此遍受生死與情緒折磨。總是被迫依附於台灣的政經地理位置，絕對性地影響了他們的物質生存條件以及對於美好未來的想像藍圖，那麼，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平潭這個貌似非典特

區的道德經濟變遷議題？首先，或許應先回顧既存的相關文獻。受到Bronislaw Malinowski(1992[1922])等經濟人類學者的啓發，英國勞工史學家E. P. Thompson(1971)重新審視十七世紀中至十八世紀初英國農村層出不窮的「糧食暴動」，認為此類事件不可化約為麥糧供需不均的飢饉生物性需求而引發的社會衝突行動，而應視為由前現代社會過渡至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伴隨政治經濟體之變化而發生的道德秩序失序現象。這個現象反映了以下社會史的事實。首先，在自由主義經濟市場邏輯全面體制化、和中央政府統一調控貨幣經濟之前，不僅俗民（尤以農民、各類小工匠和與購買麥糧關係最密切的婦女為然）常將衡量經濟行動的損益準則，常與其所屬之經濟文化社群常規化的道德判准模式互相強化和應證，派駐當地的行政首長也常自命為家戶長式(paternalistic)道德秩序守護者，故多藉由柔軟的身段和多種變通手段以回應所謂「暴動者」的需求；換句話說，於日常生活行動緊密關連的在地社群中，「暴動者」和「政治權威者」之間擁有相當程度的互相理解與彼此依存的关系，而生產並正當化這個關係的社會脈絡即為Thompson試圖申論的「道德經濟」場域。亞當斯密在《國富論》(Smith 2003[1776])中揭櫫的「不干涉主義」(laissez-faire)固然成為日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信念，然而該理論所墊基的「追求最大經濟利益」原則，並非支配暴動者的核心行動邏輯，否則這些人士便不會常以毀棄已奪取的麥糧，而做為發洩憤怒以及（更重要的是）重申社會正義的手段。第三，對於參與暴動的行動者而言，真正破壞既存社會正義和道德經濟秩序者，乃是自歐洲中古世紀以降逐漸取得社會正當性的收購商和中盤商，其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以牟取暴利的商業行為不僅違反常民社會對於（道德和經濟）「價值」的理解，也造成了鄉民和經濟作物之間的疏離關係。最後，Thompson指出，麥糧暴動於十八世紀中葉起逐漸消失的現象，應歸諸於現代國家制度的興起，易言之，道德秩序乃隨整體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之轉變而有所不同，故而深刻形塑了個人對於社會能動性、權威、社會正義和集體行動的理解和實踐。

道德與經濟價值的意義和判准模式，顯然是理解變遷社會之道

德經濟的關鍵取徑之一，而商業活動（尤以商品交易為然）的可實作方式，亦與勞動的價值、分類、及其可被正當化的範疇息息相關。歷來不少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藉此以試圖闡釋上述議題。在歷史學界，比如說，Jacques Le Goff(1980a; 1980b)這位奠基「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研究的第三代年鑑學派學者，便藉由分析九至十三世紀法國神學知識分子的論述、城鎮生活的具體物質象徵（譬如由日晷到大鐘的計時器變化）、文化產物的再現形式（譬如宗教畫作的透視角度變更）等社會史素材，以說明何以在這段過渡至現代社會的歷史階段中，新興商人階級可逐步擺脫早期放貸者「僭越神的時間」之罪惡形象，與正統意識形態的生產者（即僧侶和神學家）互相讓步協商，以建構一全新的道德經濟秩序；該道德經濟秩序的重整暗示了既存社會中勞動分工、範疇、及其社會價值的認可，Le Goff(1980c)因此也分析了諸如軍人、農民工、各類小工匠、以及娼妓之勞動意義的正當化過程。在文化人類學界，英國人類學者 Paul Bohannan(1955, 1959)在上世紀中葉非洲尚未解殖之前，即藉由分析奈及利亞Tiv族一般互不相屬的三層經濟交易領域（家戶經濟作物、可累積個人道德聲譽和經濟地位的奴隸與牲畜、可與其他社群「互換結婚」以維繫整體社會再生產秩序的女性親屬），以闡釋道德秩序和經濟交易之間的互相建構關係，並指出伴隨西方殖民勢力入侵的全球化商業體系，如何異化了Tiv族人與土地和農業作物的多重親密關係。此外，James Scott(1977, 1987)分析解殖前後東南亞農民對於社會關係和自然環境之感知與實作的變化，指出在前資本主義時期，農作收成被理解為無可預知的上天安排，農民據此發展出的長期穩定耕作方式、以及禮物互惠、土地共有、和勞動分工等經濟活動，均源自前述道德經濟和價值估量邏輯；然而，西方殖民勢力以富含資本主義色彩的理性精算與追求國際市場經濟利益之政府政策深入農村生計領域，在短短十年之中暴力地轉化了在地社會的傳統經濟模式，且當殖民國家面臨世界性經濟危機時，又經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操作方式，將在地經濟衝擊轉移為政治權力的競逐。綜合前述研究發現並批判性地回顧百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界的相關理論，Jonathan Parry 與 Maurice Bloch(1989)這兩位英國經濟人類學者指出，不論在西歐資本

主義抑或其他經濟體系的人類社會，商品經濟與狀似與貨幣制價無關的互惠型經濟活動，皆需與既存社會的道德秩序互相建構，方可同時取得經濟和道德層面的多重價值、以及在常民社會中的可被理解性(intelligibility)。

以上對於道德經濟的理解典範，顯然預設了貨幣經濟與互惠經濟無涉（或甚至對立）的必然狀態。然而，本文民族誌資料顯示，對平潭人而言，二者不僅緊密扣連，貨幣經濟且總被引用為合理化既存社會關係的至高合法性守則。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金錢幻術早已與性別和親屬意識型態互構，成為平潭在地常民的核心道德經濟準則。故而，過去十年不論在台灣「大陸人民收容中心」、建築工地等無證入境男性的勞動地點、偷渡或假結婚來台女性工作的廣義情感勞務場址（醫院、「小吃店」、酒店）、以及平潭原鄉家裡，對於「你為什麼會想來（或「去」）台灣」、「你現在最想做什麼」、「你接下來想做什麼」的問題，所有報導人的回答皆是理所當然的「我想／我要賺錢」。然而，與其說「被賺到的錢」為可轉變生活風格或階級認同的途徑，不如說「賺錢」的行動本身是證成主體社會存在價值的至高關鍵手段，且須鑲嵌在在地社會關係的倫理實作網絡中，方可被價值化；換句話說，「貧窮驅策說」不足以解釋平潭人似乎不能不出外打工的動機。

故而，「錢」既實質也象徵地區分了在地社會以「貧窮（因此必須出外打工）的過去」二元對立於「可以追上潮流地賺錢的此刻」之時間性(temporality)。也正因為如此，如趙彥寧(2010: 86)有關理想母職敘事的論文所述，被迫仰仗妻子赴台打工養家育子的已婚男性，也僅能借助貨幣評比敘事（「所以我們這裡現在女的比較值錢，男的不怎麼值錢」）以衡量自我和親密關係的價值，而足以養家的女性彷彿可輕易拋棄人妻與人母之職的態度，²⁸在前述道德經濟網絡裡，顯然

28 比方，「陳美」這位報導人所說的：「如果不得已被你台灣警察抓到要遣返，那我回去，不用嫁了，不要再找老公了，我怕透了。小孩子如果他有辦法養，就給他好了。」（趙彥寧 2010: 198）

也不令人費解；而且，女性妻母職責的變化，並不表示男性會因此反思並進而批判傳統的國境邊區陽剛實作，恰恰相反地，他們反而更加服膺「唯有暴富方可創造幸福」的道理，不斷尋找新興致富途徑。常民的相關評論頗多，且以王金為例。2006年三月他自台遣返返嵐，剛好趕上「搞項目」的潮流，「七七八八地賺了一點」，2011年在平潭晤面時，王金表示「現在隧道不好搞，查得很緊，你看前幾天江西那邊還有武夷山那邊高速橋都給它垮了」，因此轉赴青海「搞礦產」。當天他帶著四歲小兒小龍開一台SUV同我們環島自駕遊，一路上孩子持續驚呼「挖機、挖機」，王金很開心，不斷回應「對，對！這就是挖機！」。小龍是他打宜蘭靖廬遣返回來以後懷上的，出生沒多久就碰到平潭大開發，爲了自小培養他「正確的價值觀」，妻子懷孕起，王金便開始購買挖機模型。他很欣慰：「其他什麼玩具他都不愛，一出生就喜歡挖機，這孩子皮啊！見一個拆一個，現在我家客廳裡幾百台挖機模型堆在那裡！我說『好！你喜歡多少爸爸都買給你！長大以後你就是開挖機！』」王金也頗得意自己「做老公的做得好」，故而在靖廬關了兩年，妻子沒跑掉，他一返家，「又給我生個兒子」。爲了妻代夫職賺錢養家，不少境遇類似的朋友「老婆都給他搞沒了」，他認爲理所當然：「女的假結婚出去的，大概十個會『丟掉』七個，連人都消失了」；再解釋：「我們大陸跟台灣不一樣，女的結婚就賴在家裡，她一直在家裡就覺得『我老公還可以』，因爲老公在外頭打工他按時把錢給寄回來嘛。可是假若哪天她自己也出去外面闖一下，『他媽的我老公也不怎麼樣！』」；結論則是：「這也沒什麼，老公老婆的關係在我們這裡本來也就是這樣」。夫妻關係模式劇變的效應，顯然使常民們更直接赤裸地坦承親密關係的情感價值原本就必須與貨幣對價，這也就是王金所謂的「老公老婆的關係在我們這裡本來也就是這樣」，故而有何駭異可言？類似的狀況可見前節所引的林平夫婦。2011年我們之所以可在平潭見著林平，乃因他前幾年入股經營的江西高鐵隧道工程嚴重坍方，爲了躲避調查並另覓外省投資項目，他在前一個月返鄉「再找關係」。大家一同看電視時，我問林妻「你老公好不容易回來陪你，你一定很高興吧」，她卻大表不滿：「不高興！我氣死了！男人就是應該在外面，你回家做什麼？回來就表示你

不會賺錢，我丟臉死了」

以上的民族誌資料陳述與分析，解釋了何以備受金錢幻術治理所苦的平潭常民，不僅無意去魅金錢政治的幻術本質，反而更加努力地投身自身多少已知永遠追趕不上之「平潭速度」的現象。在批判理論的反思層次上，這也表示研究者不宜過度輕易地援引 Scott等道德經濟學者暢論的抵抗概念。事實上，「如何抵抗」以及「為何抵抗（或不抵抗）」本身，可能就是相當有問題的提問。如同Lila Abu-Lughod(1990)藉由Bedouin婦女研究所指出的，1980年代起學界受到Pierre Bourdieu(1977)和Antonio Gramsci(1971)的影響，日常生活層面的抵抗論述蔚為風潮，不少研究浪漫化了抵抗的意義，²⁹僅著重尋找抵抗者並闡釋其作為，卻忽略分析權力與霸權的形貌；故而，Abu-Lughod翻轉了Michel Foucault(1978: 95-96)「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的名言，提出藉由抵抗形式以理解權力形貌及其施為的看法。延伸而論，在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的晚近人類社會裡，我認為Abu-Lughod的概念可再做修正：「不抵抗」的作為（包括無感、放棄、附和、熱心服膺等等形式），乃為深入理解國家（以及跨國經濟）政體之權力運作模式的關鍵途徑之一。而本研究案例，當可有助吾人理解平潭常民的不抵抗作為，乃源自於該島逾一甲子的戰爭前沿政治地理區位，這個國境邊區的位置全面性地塑模了常民對大陸／台灣的行動關係和想像模式、極度窄化了他們的經濟活動與維生技術可能、並且使其不能不全面附庸於晚近中國與跨海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的新霸權宰制體系之下，以致於無法也不願抵抗。此乃平潭常民的悲劇。

平潭常民的悲劇不僅如此。受到晚年Foucault(2008)有關新自由主義政體與自我治理技術(technique of the self)之看法的啟發，Ann Anagnost(2004)、Hairong Yan(2003)、李紀舍和黃宗儀(2010)等中國研究的學者已分別藉由城市中產階級教育、農民工招募、企業家主體敘事等課題，以闡釋（文明、文化、人口）「素質」如何成為晚

29 她因此將該文主標定為「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或可譯為「抵抗的羅曼史」）。

近中國中央管控與市場經濟的關鍵治理模式。如Anagnost與嚴海蓉所述，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運作下，含義曖昧故而語意彈性甚大的「素質」一詞，併合了城鄉分離的戶口與資源分配制度、高等教育機構的快速私有化、以及經濟發展引發的巨幅農民工遷移等現象，成為了文化領域中力道極大的城市新興中產階級自我治理手段。該手段造成的效應不僅在於本質化了農民工「與生俱來」（故而無從提昇）的「低劣素質」、故而合理化了排除這些人士與其子女使用城市資源和設施（尤以教育為然）的規範，也強化了本身以彷彿積累資本般「自我提昇素質」的行動；其終極的效應，便是反覆證成了與國家權力合謀的新自由主義跨國政經治理技術之必然性。不過，相關學者極少分析農民工以及農村人民與素質治理術的關係。本研究發現，平潭管委會高層也訴諸素質論述以歸咎平潭發展計畫的進程與限制：首先，本節之初所引諸如「平潭速度，平潭質量」、「維護交通秩序，爭做文明公民」等等大幅樹立於交通幹道上的標語，明顯指出嵐島人民若要成為「文明公民」，其「質量」需予提昇；其次，2012年七月我們與管委會高層面談時，對方也表示，實驗區發展與招募台商之所以不如預期，乃與該地人民「素質太低」直接相關，且因「提高素質需要花很多年的時間」，故而若該區建設無法按照預定目標地達到「五個共同」的目的，皆是平潭島民本身的問題。「欠缺素質說」的效力如此強大，連平潭人也莫不如此地交相指責。比如，薛晴載我們觀覽金井灣途中，在加油站加油時員工無視於不斷插隊的摩托車騎士（即，尚無能力購買轎車者），她便憤怒地表示：「你看看，平潭人的素質就是這麼差！」、「老百姓的素質這麼樣，你覺得平潭發展有可能成功嗎？」。換句話說，晚近新自由主義主導的中國政經政策，固然應證了李紀舍和黃宗儀(2010: 57)所述，威權黨國機制因應崇尚個人經濟自由之市民社會的治理模式，而平潭代表的海西特區常民彷彿期待被治理之心態，也顯示了如Foucault(2008: 295)所指出的：「統治技藝之所以得以遂行，必有其參照範疇，亦即治理術的實作場域；經由治理，這個通常被稱作市民社會的實作場域，也成為新生的社會事實」。「背對且以永遠低劣位置反差著」台灣而形塑兩三個世代的平潭主體，即是前述黨國機制治理術的必要參照範疇；也正因為這個

「差異比對的低劣主體性」伴隨著席捲全中國的金錢幻術魔力，才使得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建設彷彿通行無阻。而平潭綜合實驗區的研究案例，或許可以提供吾人進一步理解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與國家治理之交構關係的運行方式、及其在地的社會效應。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大洋。2002。《中國第一女貪官》。北京：金城。

王小魯。2007。〈我國的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比較》第三十一期，頁35-56。

民建聯、封小雲。2010。《搭海西快車 做大「香港服務」：香港積極參與海西區發展研究報告》。香港：民建聯。

平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1998。《平潭縣誌》。北京：方志出版社。

平潭縣統計局。2010。《2010平潭統計年鑒》。平潭：平潭縣統計局。

李紀舍、黃宗儀。2010。〈新自由主義經濟人的生命政治：中國富商傳的企業家主體敘述〉，《文化研究》第十一期，頁55-82。

李鴻階等。2010。〈福建和東部地區競爭力比較與提昇策略〉，《綜合競爭力》第四期，頁76-83。

何能高。2006。《胡常清：墜落的政壇流星》。北京：人民法院。

周飛舟。2010。〈大興土木：土地財政與地方政府行為〉，《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二十六期，頁77-89。

——。2012。〈財政資金的專項化及其問題：兼論「項目治國」〉，《社會》第三十二期，頁1-37。

趙彥寧。2007。〈親屬連結、社會規範與國境管理：中國福建省無證移民的研究〉，《台灣社會學》第十三期，頁129-191。

——。2010。〈跨境母職公民身分：變遷中的中國閩北國境邊區道德經濟〉，《台灣社會學刊》第四十四期，頁155-212。

鳳凰週刊。2011。《中國貪官錄》。北京：中國發展。

二、外文書目

- Abu-Lughod, Lila. 1990. "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 Tracing Transformations of Power through Bedouin Women," in *American Ethnologist* 17(1): 41-55.
-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Monthly Book Review.
- Anagnost, Ann.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Quality (Suzhi)," in *Public Culture* 16 (2): 189-208.
- . 2006. "Strange Circulations: The Blood Economy in Rural China," in *Economy and Society* 35(4): 509-529.
- Bohannon, Paul. 1955. "Some Principles of Exchange and Investment among the Tiv of Central Nigeria,"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57: 60-70.
- . 1959. "The Impact of Money on an African Subsistence Economy,"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 491-503.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k-Morss, Susan. 1991.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en, Nancy N. 2008. "Consuming 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in China," in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edited by Li Zhang and Aihwa Ong, pp. 133-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roll, Elisabeth. 2006. *China's New Consumer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Dem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avis, Deborah S. 2000.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rquahar, Judith. 1996. "Market Magic: Getting Rich and Getting Personal in Medicine After Mao," in *American Ethnologist* 23(2): 239-57.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2008. “Eleven: 28 March 1979, Twelve: 4 April 1979,” in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Pp. 267-289, 291-316. New York: Picador.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e Goff, Jacques. 1980a. “Merchant’s Time and Church’s Time in the Middle Ages,”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pp. 29-4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0b. “Labor Time in the ‘Crisi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From Medieval Time to Modern Time,”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 pp. 43-52.

———. 1980c. “Licit and Illicit Trades in the Medieval West,”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pp. 58-70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92(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Margold, Jane A. 1995. “Narratives of Masculinity 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Bewitching Women, Pious Men: Gender and Body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Michael G. Peletz, pp. 274-2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rry, Jonathan and Maurice Bloch. 1989. “Introduction: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in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edited by Jonathan Parry and Maurice Bloch, pp. 1-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n, Stanley. 2004. “The Victory of Materialism: Aspirations to Join China’s Urban Moneyed Classe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China Journal* 51: 27-52.

Sahlins, Marshall.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Atherton.

Scott, James C. 1977.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sista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dam. 2003(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Bantam.

- Taussig, Michael. 1993.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Routledge.
- Thompson, E. P. 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ast and Present* 50: 76-136.
- Veblen, Thorstein. 1967(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Penguin.
- Yan, Hairong. 2003. "Spectr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interpreting the Labor Mobility of Rural Young Women in Post-Mao China," in *American Ethnologist* 30(4): 578-596.
- Zhang, Li. 2008. "Private Homes, Distinct Lifestyles: Performing a New Middle Class," in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edited by Li Zhang and Aihwa Ong, pp. 23-4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Žiž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三、網路資料

- Roberts, Dexter. 2014/02/20. "Workers and Taxi Driver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February 20. <http://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4-02-20/behind-chinas-labor-unrest-factory-workers-and-taxi-drivers>. (2014/08/10瀏覽)
- 自由電子報。2012/03/17。〈國台辦批陸委會 立委：對馬下指導棋〉，〈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mar/17/today-p1.htm>。(2012/08/08瀏覽)
- 京華時報。2010/09/29。〈北京衛視國慶巨獻 大型系列片《人民大會堂》〉，《京華網》。<http://dailynews.sina.com/bg/ent/tv/sinacn/20100929/23371871638.html>。(2012/09/08瀏覽)
- 華夏經緯網。2011/03/30。〈福建解讀「十二五」規劃綱要：提速平潭開發〉，《華夏經緯網》。<http://big5.huaxia.com/tslj/rdqy/fj/2011/03/2352441.html>。(2012/09/07瀏覽)
- 新華社。2011/03/1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新華網》。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2012/09/07瀏覽)

福清新聞網。2011/05/05。〈平潭速度：1天1個億 1天1個樣 20年再造1個廈門〉，《福清新聞網》。http://www.fqxww.cn/news/fjnews/2011-05-05/31663_2.html。（2012/08/20瀏覽）

新浪房產。2012/06/14。〈海峽如意城雍景苑火爆開盤創「時光」奇蹟〉，《新浪網》。<http://fj.house.sina.com.cn/scan/2012-06-14/183554290.shtml>。（2012/09/11瀏覽）